

比较

NO.1, 2015

76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兰特·普利切特 劳伦斯·萨默斯
亚洲欣快症和回归均值

埃里克·格伦·魏尔 白亚末
平台产业新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查尔斯·比恩
货币政策的未来

钱颖一
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拉贾·切蒂 艾米·芬克尔施泰因
社会保险的动机研究和最优政策设计

卡塔琳娜·皮斯托
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下）

田国强
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和未来

大野健一
如何学会工业化

张韶华 张晓东
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No.1, 2015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76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 第76辑 / 吴敬琏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086-5022-7

I. 比… II. 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8969号

比较·第七十六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5022-7/F · 300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卷首语

当前改革的重点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角色究竟如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其实，经济学对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已经走得很远，不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厘清了政府及其权力结构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还深入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领域，除了宏观调控以外，例如监管机制、标准设定、维护竞争体系、公共资源拍卖机制、最优社会保险政策设计等，理论研究与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实践运用也有大量经验与成果。我国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本质上都是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能和边界。20年过去了，这条最简单的“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依然没有多大实质上的改进。政府被“俘获”导致的腐败，触目惊心。本辑《比较》提供的就是经济学家们在探讨政府角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新的视角和思路，也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开篇兰特·普利切特和劳伦斯·萨默斯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可持续。作者把主流预测中国与印度增长维持在6%称为“亚洲欣快症”，他们认为，超高速的经济增长难以持久，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终会降至全球均值附近，用统计学术语来说就是“回归均值”。文章还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规模等角度分析两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探讨高速增长期的持续时间和可能的结束时间。谈及中国，他们指出，当企业“俘获政府”，或者企业本身就属于国家，或者由国家选择企业时，就会形成“不公开的有序交易”环境，虽然这可能造成的增长要远远高于那些体制完善而健全的经济体。但是，真正的挑战在于转型。原本国内外投资者的预期建立在与特定权力机构的特定关系之上，一旦发生转型，投资者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预期，而这会引发经济增长的骤停。相比于民主政体，中国当前的威权体制也加大了增长结果的变化范围。

在互联网的带动下，近年来平台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它不仅改变了市场竞争的格局，也对监管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近期的禁止滴滴专车事件、淘宝和工商局对峙事件，都充分说明我们现行的监管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埃里克·格伦·魏尔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白亚未所要讨论的恰好是平台产业的监管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网络效应，平台产业中会出现两类市场失灵：低效率的锁定、赢家通吃，所以，应当增加企业的数量，以强化竞争。两位作者却认为，平台市场中进入

者有能力采取策略行为，比如相对被动的“分而治之”或更加积极的隔离策略，削弱主导企业，将网络效应内部化，结果低效率的过度市场分割是更大的危险。作者尤其强调，用户的异质性会导致平台市场中的价格总是高于社会最优价格，而竞争压力不足以系统性地纠正这种价格扭曲。鉴于市场过度分割是平台产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公共政策应当使平台竞争中有效率的最终赢家尽快巩固其主导地位，让主导企业能收获创新所带来的合理回报，与此同时，必须服从由市场来挑选赢家的约束，并通过相应的监管措施来确保主导企业服务于公共利益。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的反思，这一反思还在继续。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查尔斯·比恩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中畅谈“货币政策的未来”。危机表明，将关注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存在致命的缺陷，未意识到在一些情况下它不利于金融稳定。为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未来的货币政策需要有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套，因为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抑制危险的金融失衡和保持金融稳定。比恩探讨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两种政策的典型的结合方式如何通过影响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均衡，进而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他特别提醒未来的中央银行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中国当前的教育问题备受诟病，各界人士争说教育。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教育的呢。“改革论坛”栏目给读者提供了钱颖一的文章，作为国内外公认的优秀经济学家，他却在10年前全身心投入清华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他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说明中国的教育有其成功之处。他将之归纳为“高均值”，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使学生们在这两个方面有较高的平均水平。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方差小”，也就是说，“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这一点将制约中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除了知识和技能上的高“均值”和低“方差”外，中国教育还存在一个现象：人的素养、价值方面的低“均值”、高“方差”，也就是说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同时素养差的人还不在少数。因此，在钱颖一看来，中国教育的真问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说理透彻，意蕴深长。

“前沿”栏目是两位克拉克经济学奖得主拉贾·切蒂和艾米·芬克尔施泰因的文章。这篇题为“社会保险：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分析”的文章概述了有关社会保险的大量文献，重点回顾了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对福利和最优政策选择进行定量分析的近期研究。作者们首先从保险市场中的选择行为入手，论述政府推行社会保险的动机，分析若干社会保险政策的福利结果，如失业保险、伤残保险、医疗保险等。与此同时，回顾了有关最优社会保险政策的研究，并讨论如何利用经验估计参数计算最优的保险金水平，以及社会保险设计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如强制储蓄账户、提高保险计划的参与率、改变保险金的路径或持续时间。透过本文，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结合理论与数据研究最优社会保险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如作者指出的，若要为政策制定者推行重大的社会保险改革出谋划策，还需要对这些政策如何影响整个

经济有全局性的理解。这些问题不仅是对社会保险研究的根本挑战，也是对更一般化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挑战。

在“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一文的下篇里，作者卡塔琳娜·皮斯托主要论述了与四种金融理论相对应的监管思路，以及金融监管的新方向。对于有效市场假说以及理性有效市场假说而言，关键是信息成本，因此监管要着眼于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对于知识不完备假说而言，主要是知识不完备造成的约束，因此监管要着眼于消除这些约束。而对于金融不稳定假说而言，监管要着重于矫正导致市场不稳定的内在因素；对于金融货币论来说，监管的着眼点是积极应对流动性约束。金融监管的新方向应当是结合知识不完备假说和金融货币论，将强调最优监管的现行监管框架转变成随市场变革而管理市场过程的监管框架。

“新书架”栏目中的两篇文章旨在向读者推荐两本有价值的图书。田国强的文章结合当前的改革发展形势，从改革的历史、逻辑、方向、目标、愿景、战略把握、顶层设计以及改革方法论出发，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变革给出了解读和建言，是对其新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的概述。另一篇文章是日本经济学家、越南政府顾问大野健一为即将出版的中文版新书《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写的序言。大野的《学会工业化》是一部从国别、历史比较的角度分析后发国家如何进入工业化序列的著作。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其产业政策的质量，远远超出国家规模、资源禀赋或其他任何“既有优势”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不但需要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要掌握这样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设计、实施、监督和调整，也即“政策学习”过程。他简要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他看来，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来自强劲的私人部门活力，可是在未来必须辅以明智的政策选择，才能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而且与新加坡、韩国乃至马来西亚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普惠金融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相关国际机构开始积极推行普惠金融理念。理论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消除社会排斥和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可获得性，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张韶华和张晓东的文章讨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和主要模式，并简要介绍了我国推行普惠金融的近期进展。

目 录

Contents

第七十六辑

- 1 亚洲超高经济增速将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

兰特·普利切特 劳伦斯·萨默斯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by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 Summers

- 41 让最好的一方赢：平台产业新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埃里克·格伦·魏尔 白亚来

Let the Right “One” Win: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New Economics
of Platforms

by E. Glen Weyl and Alexander White

- 65 货币政策的未来

查尔斯·比恩

The Future of Monetary Policy

by Charles Bean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80 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钱颖一
Three Observations about China's Education: Mean and Variance
by Yingyi Qian

前沿

Guide

- 86 社会保险：基于理论与数据相结合的分析
拉贾·切蒂 艾米·芬克尔施泰因
Social Insurance: Connecting Theory to Data
by Raj Chetty and Amy Finkelstein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62 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基础（下） 卡塔琳娜·皮斯托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
by Katharina Pistor

新书架

New Books

- 182 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和未来 田国强
The History, Logic and Future of China's Reform
by Guoqiang Tian
- 196 如何学会工业化 大野健一
Learning to Industrialize
by Kenichi Ohno

200 普惠金融：一个文献的综述

张韶华 张晓东

Financial Inclusion: A Literature Review

by Shaohua Zhang and Xiaodong Zhang

亚洲超高经济增速 将回落至全球平均水平

兰特·普利切特 劳伦斯·萨默斯

1. 引言

亚洲经济增长的故事至少由四个阶段组成，尽管第四阶段还尚未可知。第一阶段是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到 1980 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具有强大生产力的经济体和全球领导者。第二阶段是东亚龙的成长——由“亚洲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领头，紧随其后的是更大的东南亚经济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第三阶段则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的增长。两国分别拥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其人口总数均超过其他 8 个东亚经济体人口总和的 2 倍。

自 1980 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快速增长，此后令人意外的是，有别于既有范式，两国经济增长于 1990 年代再度加速，而进入 21 世纪后，印度增长的步伐还在继续加快（Kar、Pritchett、Raihan and Sen, 2013）。由于在

* Lant Pritchet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Lawrence H. Summers, 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校长，1999—2001 年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2009—2011 年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因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美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本文原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感谢两位作者授权我们翻译成中文。——编者注

** 感谢 David Yang 为我们提供出色的帮助。感谢评议人 Chang-Tai Hsieh 和 Robert Feenstra，以及 2013 年亚洲经济政策会议与会者们的有益评论和见解。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反映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观点。

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较高的复合增长率，再加上它们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根据佩恩表 8.0 版的数据（Feen、Inklaar and Timmer, 2013），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2011 年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和印度，并且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日本的 3 倍、德国的 4 倍^①。

亚洲经济增长第四阶段的前景尚难预料。把当前中印两国的增长率与增长较为温和的美国以及更疲软的欧洲的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外推至未来 10 年甚至 20 年，就会得出一个“亚洲欣快症”（Asiaphoria）^② 的结论，即关于全球经济将逐渐沿着亚洲两大巨人的发展轨道运行并得到日益提升。如果再考虑到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其他仍处于中下等收入水平的较大亚洲经济体还在持续增长的情况，关于全球经济重心将实现东移的观点在未来将会变成现实。

亚洲欣快症几乎变成了普遍观点。《展望 2060 年》（*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 OECD, 2012）预测，2011—2030 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为 6.6%，印度为 6.7%。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著的《中国：2030》预测，中国的工人人均产出增长率 2011—2015 年为 8.7%，2016—2020 年为 7.1%，2021—2025 年为 6.2%。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预测，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从 2010 年的 6.4% 上升到 2030 年的 17%—23%；同一时期，印度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从 1.8% 上升到 6.5%—7.9%。相对于福格尔（Fogel, 2010）预测 2040 年中国 GDP 将达到 123 万亿美元来说，这些预测相对保守。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经济增长数据的严密分析，来说明过去的表现并不能外推到未来。纵观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唯一最稳健和惊人的事实是“回归均值”。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难持续至中长期，因此，基于当前的增长速度并不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增长。所以，在随后的 20 年里，虽然不排除中国的人均 GDP 仍有可能以年均 9%（甚至 7% 或 6%）的速度增长，但是考虑到跨国数据显示出的回归均值的现象，这种增长率是 2 倍标准差之外的异

① 就目前来说，这一点当然会引起一些质疑，购买力平价虽然适合于比较生活水平，但它并不一定是衡量全球影响力的正确标准，因为国际贸易显然不是以购买力平价而是以实际汇率来开展的。

② Asiaphoria 是本文作者自创词，指那些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将会长期持续的人。——译者注。

常值。同理，尽管印度实现持续增长已经殊为不易，如果要想保持年均6%的经济增长，就得将本已缺乏持续性的增长继续保持下去。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预测的最大错误来源于对近期经济表现的极端外推，将一国经济增长率视为永久特征而非瞬态条件（transient condition）。萨缪尔森1961年的教科书预测，到1980年代，苏联很有可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在1980年代末之前，普遍的观点认为日本将继续增长且引领世界。甚或是相反的情况，比如十多年前人们对非洲普遍持悲观预测。然而，自那时起，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很多就是非洲国家。

本文除了要说明过去的增长表现对预测未来没有多大价值外，还想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都是不连续的，突然的加速和减速是常有的事。这表明，一般预测中明确或隐含的置信区间和所考虑的增长范围，会低估结果的波动范围。最近的危机就提醒我们，经济下行的风险完全被低估了^①，就像系统的脆弱性被严重低估了一样。此外，中国特有的国情——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以及威权体制——进一步增加了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给出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向均值回归的基本证据，并解释了为何用这些证据来预测中国和印度的未来经济要比当前的预测更加不容乐观。第3部分展示了这一结果在不同变量设定下的稳健性。第4部分将普利切特等人（Kar、Pritchett、Raihan and Sen, 2013）近期的研究拓展到“走走停停”型增长（stop-start growth，比如，Rodrik, 1999；Johes and Olken, 2008），并分析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大起大落的“增长阶段”。这与工业化国家使用的标准的趋势周期模型不同，但似乎更能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周期就是趋势”（Aguiar and Gopinath, 2007）。我们的分析还显示，快速增长的国家更可能遭遇增长的断层式下滑。也即，经济增长更可能突然大幅下滑，而不是逐渐缓慢地下降。第4部分还显示，在考虑中国未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景时，最基本的经验问题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恰当衡量，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存在的），而是增长率向均值的回归。第5部分是对中国的两个定性分析：对企业的高度干预以及威权体制。这两个因素都可能加大经济大幅下滑的可能性。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并讨论这些结论的含义。

① 最近的金融危机同样提醒研究者要注意风险和奈特不确定性的区别（Greenspan, 2013）。Siler（2012）认为，评级机构使用的模型严重低估了债券的违约风险，根本不是几个百分点或者一个单位量级的问题，而是差了200倍。

2.42 万亿美元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能持续吗？

2.1 “向均值回归”：分析经济增长唯一最稳健的事实

1990 年代，“增长回归”^① 理论盛行一时，它将一段时期人均 GDP 的增长放在方程左边，并将其他一切因素放在右边（Wacziarg, 2002；Rodriguez and Shelton, 2013）。在一项研究中获得的关于增长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的解释变量，一旦拿到其他研究中去，几乎都不再稳健，因而我们很难说能够从上述研究中“学”到些什么。增长回归结果对于特殊变量的敏感性是一个被较早提出并且经常被讨论的问题（Levine and Renelt, 1992）。

在早期增长研究中发现的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项事实——这些研究成果也包括我们和伊斯特利以及克雷默在 1993 年完成的一篇论文（East-erly et al, 1993）——经受住了时间和新数据的考验。增长过程具有强烈的回归均值的性质，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间增长率的差异很难持续下去，因此当前的增长对未来增长没有多少预测力。有人认为，长期增长差异大多可归因于有的国家增长慢有的国家增长快（比如阿根廷增长慢而日本增长快），而实际上恰恰相反，通常增长的差异几乎都源于一国本身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

表 1 给出了衡量增长持续性的四项测度：相关系数、序列相关（为了减少异常值的影响）、当前增长对滞后增长的回归系数和回归的 R^2 （也就是相关系数的平方）。我们使用版佩恩表 8.0（Feenstra、Inklar and Timmer, 2013）中的国民核算账户中以当前本币计价的实际 GDP 数据（因为我们不是在比较各国的水平高低）和人口数据来计算实际人均 GDP。对于所有有完整数据^②的国家，我们对其 10 年期和 20 年期的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计算出最小二乘法

① Barro 1991 年的论文，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中拥有 10000 多条引文索引。Sala-i-Martin 因为独立做了 400 万次增长回归而颇受好评。

② 当计算 10 年期的增长率时，如果拥有超过 7 年的数据，或者计算 20 年期的增长率拥有超过 14 年的数据时（一国拥有从 1953 年开始的数据，我们就计算出该国 1950 年代的 10 年期增长率），我们会计算出增长率。我们将数据少于 25 年的所有国家都排除掉——包括原本属于苏联的所有国家。我们也排除掉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异常值。

增长率。结果显示，增长的低持续性是贯穿所有 10 年期的一个一致而又稳健的事实——如果有所区别的话，也只是近期增长率（从 1990—2000 年到 2000—2010 年）较之于之前 10 年具有更低的持续性^①。这并不意外，持续性随着时期长度的增加而降低。所以，使用当前的增长率来预测 20 年后的增长率，甚至比预测 10 年后增长率更缺乏可信度。

表 1 跨国增长率在各个 10 年间具有较低的持续性

时期 1	时期 2	相关系数	序列相关	回归系数	R ²	观测值
相邻的 10 年期						
1950—1960	1960—1970	0.363	0.381	0.378	0.132	66
1960—1970	1970—1980	0.339	0.342	0.382	0.115	108
1970—1980	1980—1990	0.337	0.321	0.323	0.114	142
1980—1990	1990—2000	0.361	0.413	0.288	0.130	142
1990—2000	2000—2010	0.237	0.289	0.205	0.056	142
间隔 10 年						
1950—1960	1970—1980	0.079	0.192	0.095	0.006	66
1960—1970	1980—1990	0.279	0.312	0.306	0.078	108
1970—1980	1990—2000	0.214	0.214	0.163	0.046	142
1980—1990	2000—2010	0.206	0.137	0.143	0.043	142
间隔 20 年						
1960—1970	1990—2000	0.152	0.177	0.152	0.023	108
1970—1980	2000—2010	-0.022	0.005	-0.015	0.001	14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佩恩表 8.0 版数据进行的计算（Feenstra、Inklaar and Timmer, 2013）

表 2 给出了使用 20 年期增长率得出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同样显示出强烈的“回归均值”、增长率的低持续性以及用当前值来预测未来增长是不

^① Easterly et al（1993）给出了基本发现。表 1 给出了 100 个国家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313（与当前时期 0.337 的相关系数做比较），以及这些国家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相关系数 0.212（与当前时期中的 108 个国家的相关系数 0.339 做比较）。

可靠的（人们认为 20 年理应更能消除“经济周期”导致的波动，也更能体现“长期”增长）。

表 2 20 年期之间仅显示出了微弱的持续性，因此当前增长率在预测未来增长方面没有太大价值

时期 1	时期 2	相关系数	序列相关	回归系数	R^2	观测值
相邻的 20 年期						
1950—1970	1970—1990	0.258	0.318	0.343	0.067	70
1960—1980	1980—2000	0.459	0.454	0.494	0.211	108
1970—1990	1990—2010	0.327	0.325	0.215	0.107	142
间隔 20 年						
1950—1970	1990—2010	0.047	0.015	0.047	0.002	70

资料来源：同表 1

对于当前的问题，即“在接下来的 10 年时间里，亚洲巨人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吗？”，最相关的汇总统计就是这些回归分析。如果说除了过去的增长率，我们实际上对一个国家一无所知，那么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应该明白的。

第一，就算我们知道了一国当前的增长率并以此来预测未来的增长率，由此得到的预测结果也只能说略好于直接断言该国未来的增长率将达到同时期的全球平均水平。对未来 10 年的增长率预测的 R^2 在 0.056（对于最近的 10 年）到 0.132 之间变化。总之，过去的增长完全不能为预测将来的增长提供有用信息，在预测更长期的增长时，预测力更低。

第二，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国家当前的增长率，那么如何最好地预测未来呢？极端的情况是直接外推，也即系数为 1，或者不外推，也即系数为 0。我们的估计显示，如果预测下一个 10 年，系数应该在 0.3 左右，如果预测再下一个 10 年，系数应该为 0.2 或者更低。

事实上，这里强调的观点与《时代》杂志封面诅咒有点类似。人们观察到，一旦公众人物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不久他的职业生涯就开始走下坡路。这就是人们根据均值回归和外推预期所做的预测。在 t 时期有耀眼表现的人物，在 $t+1$ 期的平均表现往往都会比预期差很多。

从更深层次来看，经济增长率高度向均值回归的研究结果对经济增长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如果像很多模型所说的那样，一国相对不变的特征（比如天气、文化、区位、制度水平和开放度）影响经济增长，那么在变量持续的情况下，增长率也应该持续。然而，从数据来看，增长率并没有持续性。经验结果表明，这些相对不变的特征所影响的是收入水平而不是收入的中长期增长。它还表明，即便是最有利的条件，对增长的影响也会递减，除非一国能持续改善其政策环境和治理。

2.2 预测巨人未来的 GDP 水平

用当前增长外推和回归均值这两种预测方法“机械”地预测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所谓“机械性”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对中印两国一无所知，并且认为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统计规律对中印两国也同样适用），会发生什么？

通过以过去几十年间的增长为基础（以及考虑到收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初始收入水平）来预测国家增长率的回归模型，我们形成对未来几十年增长率的预测。这些预测只是将中国和印度当前的增长率及收入水平的数据代入方程式中，并将预测的结果向前延展了 20 年。基本思路（为此我们试验了许多变量）是对方程式（1）进行估计：

$$g_{00-10}^i = \alpha + \beta * g_{90-00}^i + \gamma \ln(y_{00}^i) + \varepsilon^i \quad (1)$$

然后，我们来预测未来两个 10 年的增长：通过使用估计系数和中印两国的实际增长值，计算出第一个 10 年期增长的预测，并通过第一个 10 年期的预测值来预期未来第二个 10 年期的值。

$$gp_{13-23}^{china} = \hat{\alpha} + \hat{\beta} * g_{00-10}^{China} + \hat{\gamma} * \ln(y_{2010}^{China})$$

$$gp_{23-33}^{china} = \hat{\alpha} + \hat{\beta} * gp_{13-23}^{China} + \hat{\gamma} * \ln(y_{2023}^{China})$$

表 3 列出了一系列在不同条件下“向均值回归”的回归结果：有收敛项的和没有收敛项的，有 20 年滞后项以及没有 20 年滞后项的，以及时间间隔是 10 年还是 20 年的。给定增长率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稳健的弱持续性，所有的回归分析都毫不意外地给出了一个大约在 0.20 到 0.32 之间的滞后增长系数。

表3 当前10年的增长率对过去10年增长率的回归(考虑到收入的滞后水平)

因变量 (Y)		常数	滞后的 增长率	二次滞后的 增长率	人均 GDP 初始水平	R ²	观测值
2000—2010 年间增长率	系数	0.023	0.205			0.056	142
	t 检验值	10.758	2.887				
2000—2010 年间增长率	系数	0.068	0.329		-0.006	0.177	142
	t 检验值	6.632	4.572		-4.519		
2000—2010 年间增长率	系数	0.074	0.274	0.161	-0.006	0.222	142
	t 检验值	7.227	3.749	2.812	-5.135		
1990—2000 年间增长率	系数	-0.009	0.240	0.045	0.003	0.157	142
	t 检验值	-0.665	3.561	0.683	1.679		
1990—2010 年间增长率	系数	0.031	0.241		-0.001	0.117	142
	t 检验值	3.164	4.272		-1.24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佩恩表 8.0 版数据进行的计算

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印两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预测了在接下来的两个 10 年间，中印两国以美元计算的 GDP（并没有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过调整）^①。我们使用联合国中期生育率预测得出的人口总量。这些数据显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在下一个 10 年将继续保持在每年 1% 的水平，此后才出现下降，而中国的人口总量将接近零增长。

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以美元计算的

① 因为都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是选择官方数据还是购买力平价（PPP）数据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不管用什么基础，它们都会同比例变动，因为我们假设汇率不变。很明显，用官方的汇率会使中国和印度经济看起来相对于美国（或 OECD）的规模偏小，如果用 PPP 计算，会使相对规模更大。然而，如果用 PPP 数据，我们就需要考虑收入水平和各时期 PPP 价格的关系，这只会徒增计算的复杂性但没有实际意义。